

王琦教授中医教育思想概述※

● 王 济*

摘 要 全国名老中医王琦教授的教育思想可概括总结为:重视优秀临床人才的培养、重视思维方式的培养、重视全面素质的培养。以上教育思想以及对于中医教师、中医教育机构和办学方法的建议,构成了王琦教授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对当代中医教育有借鉴和指导的意义。

关键词 王琦 名老中医 教育思想

王琦教授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二级教授,是兼中医临床家和中医科学家于一身的中医学家,三次被国家卫生部、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遴选为全国著名中医药专家,并获得优秀临床人才指导老师称号。先生曾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从事中医教育工作14年,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执教至今已逾11年。从1987年开始培养第一位硕士研究生,至今已培养博、硕士研究生67名,博士后4名,学术思想继承人7名,以及研修医生数百名。先生教书育人数十载,培养的学生遍布中国各省及美、加、澳、韩等国,大多数在中医医疗、教学、管理各个岗位上已成为骨干人才。作为一名导师,他对中医学教育的目标、方法、成才规律以及医学人文精神等大量精辟的论述,构成了王琦教授中医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其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1 重视优秀临床人才的培养

根据中医教育的特殊性,王琦教授提出高明临床家的培养是中医学学术发展战略的首要问题。在1986年的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学术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王琦教授对于当代教育体制下,中医人才应该向什么方向培养以及如何培养进行了论述^[1]。先生认为,中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离开实践就失去了活力。高明临床家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社会贡献度大,并由此而推动本学科创造性的进展;其二,高明临床家水平往往可显示或代表某一个单位水平,因此高明临床家社会知名度往往对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乃至一个领域或更大范围内产生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其三,名师(医)出高徒,由于高明临床家的作用,还可以带出数个乃至成批的尖子人

才。

针对以上目标,王琦教授提出改革中医院校现行教育、开展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制度、扩大中医临床研究生比例、加强师承教育、举办高级中医研究班等具体方法。先生认为,应改变中医院校普遍存在的以课堂为中心、教材为中心的状况,应以培养合格的中医医师为目标。其教学应本着早实践、早临床的精神,尽可能为高年级学生提供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的机会和场所,帮助他们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创造结合起来,进入最佳思维状态,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中医学院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临床实践和知识,在基础教学同时,坚持临床医疗实践,有助于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此外,在研究生招生制度方面,王琦教授提出,中医临床研究生从招生、命题、考核、学位授予应当以临床为中心,避免从文献到文献的“纸上谈兵”,全学时中应有2/3或4/5时间在门诊或病房进行“摸、爬、滚、打”,练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选择研究课题应以临床题目为限,并围绕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王琦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王琦名医传承工作站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 王济,女,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医体质与生殖医学的研究工作。

• 作者单位 北京中医药大学(100029)

选题收集一定数量病例、病种脚踏实地进行。

从 1986 年到如今已经 20 余年,实践证明王琦教授提出的以临床为中心的中医教育目标是正确的,其方法是可行的。2010 年《中国医学科技发展报告》关于中医学进展的回顾显示:从 1990 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了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目前,已完成共四批指导老师遴选工作,共遴选 2133 名,培养继承人 3337 名。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开展,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临床人才和中药技术人才。

2 重视思维方式的培养

王琦教授认为,衡量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并不是仅仅以知识储备量来加以评定,人的头脑并非仅仅是一个堆放知识的仓库,更重要的是以特定的方式使知识元素加以联接,转化为智能。所谓智能,是指一个人具有知识、技能和能力组成的多序列、多层次的动态综合体,从而产生无限的创造力,中医历来强调人的知识“活化”,而死记硬背,是不可能成为良医的。尽管治病疗疾,却少理论基础,不是由博返约,而是在某一点上相承沿袭,则是低水平的重复,即便近几十年来真正通晓(只是“通晓”未谈“精通”)中医经典著作和代表性名著的人也属极少。中医队伍中有人是“名医”,但并不一定是“良医”,如此形成了群体知识结构的危机。

2009 年,王琦教授在第二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启动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医人要铸中医魂”,他指出,中医的“灵魂”就是理论思维,是中医的主体意识,临床中的理法方药都应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行。

在实际工作中,无论是完善自我,还是施教于人,王琦教授都非常注重理论思维的重要性。他常说,继承学习应提倡“神似而非形似”。一位好的老师传授给学生的不仅是些基础知识,诊疗技术和经验,更应教育学生重视在疾病诊疗过程中思维的方式,认知方式,学些方法论。对一些疑难病或在治疗过程中临床疗效不好时,除了应总结分析外,更应从思维方式上、思维角度上去考虑。学生跟老师学习亦不仅限于继承老师的秘方、验方、临床经验之类。流于表面观察、总结老师看什么病,用什么方,加什么药。这种学习的结果仅为“形似”,而更应观察、分析、思考老师在临床诊疗活动中,在著书立说中其思维方式、思维过程和思维取向的分析和总结。惟此,才能继承老师几十年思想结晶的真谛,亦即先生强调之“神似”。高明的医术是由人脑产生的,如果单纯注重知识与技术的灌输或积累,势必头脑僵化,当然谈不上应变力和创造力,也就是所学知识与技术不能真正“活化”。

曾有门人总结王琦教授的思维特点为:第一,宏观思维。即对中医学整体发展方向的把握、医学模式、学术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和对中医现代化战略性展望。先生非常重视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思考,他认为,中医基本理论是中医学学术之根,直接关系到中医学的兴衰,关系到中医学的未来。他指出,欲求中医之兴,必求学术之振兴,欲求学术之振兴,必求理论之振兴。第二,抽象思维。如先生在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对很多定义的概括和提出,对很多基础理论问题的质疑和思考。第三,求异思维。先生理论思维的形成和发展

与其重视变革思维模式是分不开的。在长期的临床实践、科研、教学中,先生矢志不渝地强调应克服习惯思维障碍,大力倡导求异思维。第四,辩证思维。如先生对辨病与辨证关系的论述就反映出辩证思维的特点。先生提出应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在辨病、辨证的同时,辅以辨体、辨时、辨症论治,形成科学规范的开放式诊疗体系。根据疾病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诊疗方式,既可专病专方,又可辨证施治。既可辨中医之病,又可辨西医之病,吸收现代科技手段、检测手段,而这些选择的基础应该由疾病本身的特征来决定。而不应人为去限定或套用。第五,多元思维。先生常引用已故著名老中医姜春华教授的话“学习中医不要怕走样”来鼓励我们多学习新知识、学习西医学、外语等。在多年的临床、教学、科研中常运用多元思维特点来解决问题。如先生在从事中医体质学的研究中就大量借助西医学、体质人类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来完善、充实中医体质学;在从事中医腹诊研究中就和清华大学有关机械仪器方面专家合作,共同研制出中医腹诊仪。这实际上既是学术上的兼容,也是思维上的移植。在临床诊疗活动上,先生多元思维的特点则更是游刃有余,屡见奇效。第六,反向思维。先生常通过对中医学历史、现状进行深刻的反思,通过与相关学科如西医学的发展模式和取得成果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探寻完善和发展中医学的途径^[2]。

正因为具备这种综合多元的思维方式并且能在学术研究中灵活运用,王琦教授开创了中医体质学、中医男科学,完善了中医藏象学、中医腹诊学,非常好地做到了

学术的传承、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3 重视全面素质的培养

王琦教授认为,中医学是一个开放性的、知识密集型的学科。作为一个医生,应该“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具有渊博的知识面。中医人才的知识结构,应该是医学知识、自然知识、社会知识的相互渗透交叉,需要一个网络型的知识结构。当代对中医人才的知识结构比任何历史时期有更高的要求。这一知识结构应具有知识、能力、科学方法“三个要素”。并且应包括“三个基础”:第一,文史哲及人文学科基础。如史学、哲学、文学、古代汉语、外语等;第二,现代自然科学基础。如数、理、化、生化及横向科学知识等;第三,专业基础。如中医经典著作及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中医临床各科知识、方剂、药物及现代医学基础知识。

中医高素质人才还应该具备“三种能力”,即继承能力、临床实践诊疗能力、创造能力。继承能力体现在能够正确理解并传承中医理论和临床的精髓;实践能力体现在掌握丰富知识的前提下,能够正确运用中医的理论和思维方法进行临床实践;创造能力体现在运用现代辩证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的能力。作为一个当代中医和未来的中医工作者,不仅要有合理的知识结构,而且需要不断调整知识结构,不断输入新的知识信息,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3]。

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王琦教授的具体要求是“四个会”,即会临床、会科研、会著述、会演说。可以说,这四个方是一名高素质中医人才的具体体现。

如果能做到这四个方面,也就代表了中医教育的成功。而先生自己在学术之路上精彩演绎着这四种素质,给学生树立了很好的楷模。

在平时对学生的言传身教当中,王琦教授常常教导学生,优秀人才是“做人”、“做事”、“做学问”三者的统一。医学是认识、维护和增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促进机体康复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即同情病人、关爱病人、一切为了病人的健康利益,则体现了医学的本质。正如先贤所说的“医乃仁术”、“仁者爱人”,王琦教授非常重视“治人”和“治病”的关系,这种思想体现在他对患者诊疗过程中,不仅关注疾病,更加关注“病人”。先生数十年来坚持在临床第一线,经他治愈的患者数以万计,但每一次门诊、对待每一个病人都十分认真。临床遇到疑难病症,他常查阅资料至深夜,慎重考虑后再予处方,并嘱咐学生进行随访,跟踪疗效,一则解答患者之难,二则提高学生对于疾病的整体把握。

在科研工作中,王琦教授是一位治学严谨、诚实守信的学者。虽然已经承担过十几项国家级重大课题,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每一项课题的实施过程中,仍然亲历亲为。对于课题研究得出的数据,总是责成课题组成员认真核准,保证准确可靠。对于出版文献的参考和引用资料,也总是认真校对,溯本求源。一篇文献从撰写到发表,经常修改数十次才能付梓。他常说:医学科研不能马虎,更不能弄虚作假,医关人命,这是作为学者,作为医生的基本道德准线。

王琦教授常常教导学生做人要学会“感恩”,而他自己正是用忠于中医学术的激情和报答社会的

感恩之心感染着每位学生。

4 对中医教师、中医教育机构和办学方法的建议

在2006年发表的《师承论》^[4]一文中,王琦教授提出“师非人人可为”,认为为师者必须具备多种素质。先生视五类人为“不可为师者”。第一,学无广,不可为师;第二,学无勤,不可为师;第三,术无专,不可为师;第四,心无诚,不可为师;第五,目无远,不可为师。这五个方面,师生之间应当互勉。老师要声高望远,殷殷授业,以明堂之音立魂魄,以返本开新为精神,启后承前。

早在1990年,王琦教授就发表了《确立“一个主体,两个能力、三个面向”的办学思想》的论文^[5],明确提出中医研究生教育的正确途径应该是:以中医学术为主体,注重临床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培养,教育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在2011年的中医“新八老”座谈会上,王琦教授以“传承中医特色优势,做好新时期教材建设工作,实现中医本科教育革命性转变”为题对中医本科教育和教材改革提出了建议。建议加强学科分化,更新教材内容,强化对临床的指导,突出优势病种。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应当加强中医的主体性思维,在中医临床教材中,应加强中医主体性思维和临床的衔接,以及对临床的指导,并且,应重视教育的层次性。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体现不同教学层次的要求。本科教材应当以中医基本知识、思维能力的培养为主,研究生教材应当以基本的中医思维和科研能力的培养为主,而博士生教材就应

(下转第28页)

马来人、印度人多民族和睦相处,具有多元文化、语言、饮食参合、包容的特点;地处热带,海洋气候,但空调盛行,一日两季,“一雨知秋”,室内外温差大,人们普遍寒热适应力强;同时社会与自然环境良好,安全、安定、有序、快节奏,人们守规矩。诸多因素,造就了新加坡人具有较强适应能力、

包容心态和进取精神。而本人主讲的班种为七年制夜班(兼读班),学员特点是:年龄偏大,机械记忆力较差,但理解力较强,由于白天工作,晚上精神状态欠佳。要求教学:一是时间不能过长,二是必须有兴奋点,三是教学形式多样化。

《伤寒论》虽然距今 1800 余年,但源头活水,仍是中医之根和魂所在。跨越历史鸿沟,分享人类文明;释放经典能量,彰显中医魅力,是我们中医人、伤寒人的责任与使命。让“经典”活起来,赋予现代活力与气息,我们将不断努力。

(上接第 25 页)

当以中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主。

在《万里云天万里路,一重山水一重天——我所走过的治学之路》一文中,王琦教授将自己的治学生涯总结为博涉医源之路、立言开新之路、全科专长之路、学科纵横之路、万里行进之路和未来探索之路^[6]。

老师走过的路也就是学生正

在跋涉和未来要走的路,教育的真谛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

- [1]王 琦.造就高明临床家是中医学术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J].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药学术发展战略研讨会,1986.
- [2]骆 斌.论王琦中医理论思维与学术成就[C].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出师论文,2000.

- [3]王 琦.中医振兴与人才知识结构[J].中医药信息报.1986 年 1 月 19 日.

- [4]王 琦.师承论[J].中医教育,2006,25(3):65-68.

- [5]王 琦.确立“一个主体,两个能力、三个面向”的办学思想[N].中国中医研究院院报,1990-11-15.

- [6]王 琦.万里云天万里路,一重山水一重天——我所走过的治学之路[J].中医药通报.2008,7(2):1-8.

中医文化

关于“药店”由来的小典故

中医史上第一家官办的药店诞生于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 1076 年),是大名鼎鼎的改革家王安石批准创建的。当时,王安石基于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王雱英年早逝,尤其是自己久病缠身,决定辞职而归隐山林。临别政坛,他命人在首都开封创设一家“太医局熟药所”,也叫“买药所”,可以说,它就是现代中药店的前身。

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各地曾多次发生自然灾害。他虽然表示“天变不足畏”,但看到那么多病人痛苦的样子,常常深感不安。尤其是当他得知病者缺医少药,有些人又乘机制造和贩卖假药时,更是百感交集。这时,有人提出建议:应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一方面研制一定规格的各种剂型成药,如丸、散、膏、丹,由国家专利出售,不许个人或相关部门私自制作;一方面在水旱疫疠之灾时,给百姓发放药剂。王安石听罢大喜,当即采纳了意见,并组织专门人员落实。

“太医局熟药所”成立后,大大方便了病人,也为政府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受到了朝野的一致赞许。所以,王安石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熟药所”的“生意”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到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 1103 年),药所已增开到七所。几年后,五所“熟药所”更名为“医药惠民局”,两所“修合药所”更名为“医药和剂局”。与此同时,类似的药局犹如雨后春笋,迅速出现在全国各地。再后来,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制药和卖药渐渐分离,从而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药店,专以卖药为业。